

善恶之上

胡宏·性学·理学

向世陵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善恶之上

胡宏·性学·理学

向世陵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善恶之上: 胡宏·性学·理学/向世陵著.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0.1

ISBN 7-5043-3452-9/B·89

I. 善… II. 向… III. ①胡宏 (1106~1162) —性学—研究
②胡宏 (1106~1162) —理学—研究 IV. B244.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1493 号

善恶之上——胡宏·性学·理学

作 者:	向世陵
责任编辑:	牟国栋
装帧设计:	烛 明
责任校对:	王 杰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66093580 66093583 68013201
社 址:	北京复外大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社科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30 (千) 字
印 张:	9.375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2000 册
书 号:	ISBN 7-5043-3452-9/B·89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引言 宋明理学的走向与流派

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自宋代以后，主要表现为理学这样一种特定的阶段性哲学思维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因宋、明两代为其理论的创立、形成和发展时期，故又称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成熟阶段的代表。在从北宋中期开始直至清初的700年间，在“理学”这样一个总的框架结构之下，出现了众多的具有不同学术特点和倾向的理论体系，但从整体上来归纳，一般有两派和三派之分。

两派的概念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其一是指理学作为儒学的组成部分，它从传统儒学继承而来的义理与象数之分。理学的主流派无疑是义理派。作为彻底打破“疏不破注”的经学原则和强调阐发义理、以己意说经的新的学风的倡导者，理学本就是义理之学。但是，理学同时也是象数学的继承者。被公认为理学创始人的“北宋五子”，就包含有代表象数派的邵雍。事实上，义理与象数二者从来不能完全割裂。在自觉的意义上，流行的观点认为是朱熹首先将二派统合起来。其实，这一工作早开始于朱熹之前，胡宏的性学创造就是从两派的结合上来进行的。当然，结合的工作并不否定义理与象数两大派各有自身独立的生存价值。

其二则是专指作为对传统儒学的变革的理学而言。这也是更具典型意义或者默认状态下的理学的分派，它的形成与义理派内部各自特定的义理间架相关。通常所谓理学的两派、三派或多派的划分实际上都是在这意义上进行。

两派之分形成于南宋“鹅湖之会”的朱陆对峙。陆九渊以“易简工夫”和“支离事业”对举，明确了他所创心学与朱熹道

学的分歧。并由此回溯到北宋，以大程、小程分别开出心学和道学。在后来的发展中，王守仁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理论，使之定型为陆王心学，并与程朱道学对立和论争。但他也力图使二系沟通起来，以心学统一道学。与这两大体系相并列，王廷相、王夫之等一批思想家继续北宋张载以气为本的理路又大加拓展，从而形成了第三个理论系统——气学。

道学（理学）、心学和气学的三派之分虽然一直流行，但与理学史的实践显然又存在着差距。理学在理学史上通称为“性理之学”，这在明清时期已由封建国家加以认定。“性理”作为性命义理或心性理气之学的简要概括，较为恰当地表述了理学的本质即在心性理气的逻辑结构之中。而道学、心学和气学的三分因其忽略了性学一系，而难以概括理学发展的全貌。与内地学者以哲学最高范畴是什么来划分流派有别，海外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儒家强调心性而贬低理气，否定气学一派的存在价值，代之以胡宏一刘宗周为代表的最为“圆整饱满”的“心性合一之模型”，即成另一三派。其划分的标准是看理学家的本体范畴是“即存有即活动”还是“只存有不活动”。那么，忽视性学的内地三派之分与只重心性、否定“理学”和气学并从而将心性与理气割裂开来的港台三派之分，实际上都不够完善，而有以偏赅全之嫌。

回顾理学的兴起和发展，我们发现，通常认为北宋理学（道学）已分为不同派系的看法并不确切。因为理学虽说是从北宋开始，然北宋实际只有兴起于不同地域的濂学、洛学、关学及先天象数学等，而无典型意义的“理学”，典型意义的理学乃是由于后人的概括。而这一概括之所以可能，在于其所概括的学派间之同必大于异，以区别于古文学、新学、朔学、蜀学等的异大于同。从而，北宋既无“理学”，也就谈不上理学的分派，理学的分派最早是从胡宏对北宋学术的总结和他的性学的提出开始的。

作为对北宋学术的总结，性学的提出，其意义是双重的。它

既是区别于气本论与理本论的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又成为不同学派完成其理论创建工作的构成要素，而为整体“理学”的形成所必需。从理学史的实践来说，在气学、道学、性学再加上后来的心学的四大派中，性学与气学的情形较为相似。宋以后形成并影响理学发展几百年的是程朱道学与陆王心学的对峙，以致人们一提到理学就是程朱陆王，气学和性学却未有如此“显赫”之地位。对此问题，我们从以下两方面来稍加分析：

一是道学、气学和性学都属于客观性的学派，理、气、性都具有不依个体的主观好恶为转移的特性。而客观派的最大代表是朱熹，濂、洛、关、闽的理学定位原本也是将朱熹置于集大成者的地位的。事实上，朱熹的确也继承了气学和性学的思想因素，理在气中，而性亦即理。朱熹对张载、胡宏的学说虽有批评，但他既不反对气化，也不反对性本。更重要的是，气学、性学和道学三方都注重客观天命（天理）的渊源，认可存在有相对确定的必然原则和标准，所以朱熹容易将三者统一起来。而心学则主要是一种主体性的价值体系，一切客观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实际上都取决于主体的判断，对吾心而言，客观必然原则说到底是不存在的。所以，主观心学与客观道学的冲突也就势所难免。

二是在胡宏来说，他自己所创立的体系虽然是性学，但他对北宋各派的甄别和总结却是以一个基本的预设——濂学、洛学、关学和先天象数学共属于“道学”（理学）为前提的。他认为，传统儒学所以导致“道学衰微，风教大颓”，不是儒林无人，而是学者都迷恋于章句，抓不住要领。而理学的要求正好是针锋相对，即于“见处要有领会，不可泛滥，要极分明，不可模糊”^[1]。而这要“领会”“分明”的“见处”，在胡宏就是“性”。以性为据，才能总结出“道学”，并与其他哲学派别区别开来。

因而，胡宏将他开创的性学，看做是对他首先概括出的北宋“五子”学说的自觉继承和对“道学”的完善，而不是想要从道

学中独立出来。作为后继者的朱熹同样也没有把自己的学说与性学、气学对立起来。只有陆九渊心学兴起，才在自觉的意义上与朱学或道学相对立。从而，在这四派之中，朱陆之间存在有明显的门户之争，而它们与性学和气学则只是表现为理论的差异。就性学来说，它虽然属于客观一派，但性体较之天理本体和太虚气化，它与心体的亲和力最大，是客观派中与心学联系最为紧密的一派。换句话说，性在外与气、理相通，而在内则与心相贯。故比之气、理、心的本体范畴来说，性具有更大程度的普遍性和兼容性。朱氏“支离”和陆氏“易简”的对立在这里并不存在，性是博与约的统一体。所以，是朱陆而非是别的学派之间形成相互对峙，也就是不难理解的。

由朱陆对峙而引出的朱陆异同之辩，经宋历元至明，绵亘数百年，一直为理学家们所关注。明中叶王阳明心学兴起，王学虽然反对朱学，但阳明也作《朱子晚年定论》，“委屈调停”朱陆之异，力图把道学统一到心学的轨道上来。王学理论的重心虽然在心理为一，但所由构成并为之辩护的基本工具却是性。由于性与理、与心均相通兼容，通过性的中介，道学之理与心学之心就可以相互过渡。所谓“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2]便是如此。即通过性之桥梁，王守仁最终完成了他心理为一的心本论思想体系。那么，从性出发，就可以更加容易地解释迄今未得以合理说明的气学、道学、心学等派虽有若干的冲突，但最终又联系在一起、构成为整体或典型意义的“理学”的历史事实。

注释：

[1] 《与谈子立书》，见《胡宏集》，1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2] 《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王文成公全书》卷二。

第一章 性学兴起

性学作为理学的一个基本派别，兴起于宋代。宋代理学是整个理学的源头和基础。就总的趋势而言，大体经历了一条双峰型的曲线，可谓两高一低。约从北宋仁宗后期、即 11 世纪 50 年代起，周敦颐、张载、王安石等北宋思想家开始讲学授徒，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派。此后直至徽宗大观元年（1107）程颐去世为止，以濂学、洛学、关学和邵雍象数学的形成为标志，可谓理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其基本的特点，是学者们冲破了唐代以来“疏不破注”的经学教条的桎梏，凭己意解经说经，各自著书立说，讲学授徒，不同特点的学派和不同的思想体系开始创立起来，出现了自先秦学术发展以来的又一次新的百家争鸣。儒学的发展在经历了上千年的不景气之后，迎来了自己的真正复兴。在不同学派的相互辩驳中，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逐步壮大起来。

但在程颐去世以后，以杨时、游酢为代表的二程的弟子们，大多只能祖述其师说而缺少创新，加上政治上的党争，特别是随着北宋末年民族矛盾的尖锐化和最终导致的北宋的灭亡，使理学的发展又走向低潮。

宋室南渡，理学的重心也由关、洛转移到东南。胡宏的理学生涯就开始于这样一个转折时期。到南宋高宗绍兴中期（1147 年前后），以胡宏为代表的胡氏兄弟继承了二程洛学和胡安国的家学，并予以创新和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理学发展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正是由于他们的学术活动，首先在湖湘地区打破了理学延续 40 年的沉寂，才使理学的发展又重新活跃起来。

胡宏以性为本的思想体系的提出和阐发，意味着理学在经历了两宋之际剧烈动荡的冲击以后，又步入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作为南宋重要的理学派别，湖湘性学的兴起在学术形态的演变中标志着理学客观派理论创建时期的结束和系统化时期的开始^[1]。到绍兴末年（1162）胡宏去世的时候，理学已在整个东南地区发展起来。从“东南三贤”（湘学张栻、闽学朱熹和婺学吕祖谦）鼎立到朱陆争辩对峙，理学的发展迎来了比北宋时期更为宏大、精深的又一次高峰。而它们的发端便是胡宏性学的创立。

一、父子身世，明暗不一

胡宏，字仁仲，宋建州（今属福建）崇安人。因后半生长期在湖南衡山五峰（祝融、天柱、芙蓉、紫盖、石廩）下居住和讲学，学者称五峰先生。

胡宏的原籍并不在崇安。他的祖上原在江南一带居住。唐末时受战乱的影响，由八代高祖胡夔带领向南迁移，最后定居于建州崇安东南的籍溪旁。六传到胡宏的祖父胡渊，曾授学江浙，以宣议郎致仕，后一直在家开馆授徒。赠中大夫。父亲胡安国（字康侯），生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绍圣四年（1097）进士，授职荆南教授，入朝为太学博士。随后胡安国的官职虽不断有升迁，历官至中书舍人、给事中兼侍讲、宝文阁直学士等。但总体上他却常辞常退，40年的仕宦生涯中，实际履职不满六载。究其原因，除了屡遭权贵打击排斥之外，他的主要兴趣也不在官场名利，而在著书讲学。他曾自称：“吾平生出处皆内断于心，浮世利名如螻蛄过前，何足道哉！”^[2]以他一生的品行衡量，可谓不误。

胡安国学术一般都归属于二程洛学系统。但他虽然推崇二程尤其是程颐的的人品学术，却终未拜见过二程。他与二程高弟谢

良佐、杨时、游酢等人关系极好，对其学术的由来，他曾专门进行过解释：“吾于谢、游、杨三公，皆义兼师友，实尊信之。若论其传授，却自有来历。据龟山（杨时）所见在《中庸》，自明道（程颢）先生所授；吾所闻在《春秋》，自伊川（程颐）先生所发。”^[3]这既点明了他的学术上接程颐，也道出了他的学术兴趣在《春秋》。胡安国于五经之中独尊《春秋》，倾其毕生精力于此，目的在于维护和强化儒家的伦理纲常，为封建统治者提供长治久安的统治思想。同时，他也以此来指导自身的践履。在宋代理学家中，胡安国是能够在官场进退和学术研究中坚持践履自己道德信念的不多的学者之一。从而，他也赢得了二程弟子们的极高赞誉。谢良佐说：“胡康侯如大冬严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独秀也。”^[4]二程的另一弟子侯仲良则称：“视不义富贵如浮云者，当今天下，惟公一人耳。”^[5]这些对于胡安国人品的称赞，不完全是溢美之辞。宋室南渡，胡安国不负众望，与杨时、尹焞（二程弟子）等人一道，实际担负起了接续两宋理学的使命。《宋史·胡安国传》称：“渡江以来，儒者进退合义，以安国、尹焞为称首。”^[6]这些都不是没有道理的。胡安国虽主要还是一名经学家，但由于私淑二程和与二程弟子们的深交，他实际上是以理学家的思辨来注解《春秋》的，从而也才使他的《春秋传》能得到理学家的青睐，并在后来被统治者确定为科举取士的教科书。这一切都给胡宏以深刻的影响。

胡宏的身世史载不详，其生卒年历来不甚确定。比较直接的记载，只有弟子张栻序胡宏文集时所言“仅得中寿”一语。生年今大致有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四年（1105）、五年（1106）等说，卒年则有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三十一年（1161）、三十二年（1162）等说。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胡宏集》点校本时，点校者吴仁华先生已对胡宏的生卒年进行了考订（见该书卷首），其结论是胡宏生于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卒

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享年 57 岁。笔者以为，先生对胡宏生年的考订是可信的，故采其说。然对其卒年的考订，否定绍兴二十五年说是正确的，因为在这以后，胡宏还有不少的活动；而对于绍兴三十二年的否定，则是根据张栻《答陈平甫》书和朱熹《跋胡五峰诗》来进行推论。其实，对这两条材料的恰当解释，应当得出胡宏的卒年在绍兴三十二年的结论。

朱熹《跋胡五峰诗》说：“初，绍兴庚辰（绍兴三十年，1160），熹卧病山间，亲友仕于朝者以书见招，熹戏以两诗，代书报之曰：‘先生去上芸香阁，阁老新峨豸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风月要人看。瓮牖前头列画屏，晚来相对静仪刑。浮云一任闲舒卷，万古青山只么看。’或传以语胡子。子谓其学者张敬夫（张栻）曰：‘吾未识此人。然观此诗，知其庶几能有进矣。特其言有体而无用，故吾为是诗以箴警之^[7]，庶几闻之而有发也。’明年，胡子卒。又四年，熹始见敬夫而后获闻之，恨不及见胡子，而卒请其目也。”^[8]吴仁华将朱熹这里提到的绍兴三十年与“明年”简单相加，得出绍兴三十一年（侯外庐等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亦采此种加法），其实，这样的简单相加是大有疑问的。

朱熹已经言明，绍兴三十年他尚在崇安山中养病，他写给在朝廷任职的胡宪、刘珙的两首诗，要遇好事者再转传到十分偏远的衡山五峰下的胡宏，这一数千里“接力”传邮的时间差是不能忽略不计的。更重要的是，胡宏对朱熹作出评价是在与张栻会面之时，而张栻拜见胡宏之事，在他的《答陈平甫》书中已指明是绍兴三十一年，在此之前，胡宏不仅不识朱熹，连张栻亦不识！因而，不应当以朱熹做戏诗时的绍兴三十年为基数，而应当从胡宏对张栻谈此诗的三十一年算起，即“胡子卒”的“明年”，是指在此之后的第二年——绍兴三十二年（1162）；朱熹见张栻则是后四年，即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这一年因张栻父亲、抗

金名相张浚去世，张栻护丧过豫章（今江西南昌）时，朱熹曾登舟哭送，与张栻有三日之谈。从朱熹深感张栻“名质甚敏，学向甚正”来看，双方显然谈到了各自的学统和师传。后来，全祖望在《跋宋史列传》中判定胡宏卒年在绍兴之末（三十二年），王梓材在校补《宋元学案·五峰学案》时亦从其说，并推测胡宏与胡宪（卒于绍兴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前后卒，笔者以为是可以成立的。^[9]

二、学宗伊洛，千里奔走

胡宏出生于崇安籍溪^[10]，排行第三，上有兄（胡寅、胡宁）二人。胡宏出生的时代，北宋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宋徽宗、蔡京集团的腐朽统治和残酷敲诈下，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是一片凄凉。到胡宏十多岁的时候，由于蝗灾、水灾等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大地主的土地兼并加剧，农民不堪忍受，终于爆发了两浙的方腊、京东的宋江、河北太行的高托天等领导的持续不断的农民起义。所谓“庸邪继轨，阉官握兵，求便其私，不为国计，内修宫室，治苑囿，外拓边疆，筑城立栅。索赋不充，移易经营；经营不充，始有横敛；横敛不充，公私俱匮，天下力竭才尽。虽有感恩戴德之私，迫于威虐，如火销膏，祖宗之泽日益斩矣。故金人未动，而方贼已称兵于江表，群盗已充斥于太行。……须臾远近继起，连年未定。”^[11]而在民族矛盾方面，自北宋政权建立开始就已构成的宋辽的对立，由于女真族的兴起和金国的建立，辽在金和宋的联合进攻中走向灭亡。金军灭辽以后，便将攻击的目标对准了宋朝，宋与金的矛盾成为了主要矛盾。但在宋政权一方，宋徽宗、王黼、童贯等只知纳贡求和，不作任何抗金准备，军事上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与中原战场的激烈对抗形势相比，崇安籍溪这一“西南僻陋

之邦”则是相对稳定的。胡家本是一个儒学气氛极为浓厚的家庭，父亲胡安国又经常称疾在家，就使胡宏能够容易地“幼闻过庭之训”，并与其兄长们一道，有充裕的时间来钻研和探讨学问。但就其所学来说，他是“少习干时之业，长闻《大学》之方”^[12]，少时从政为官的愿望占据支配地位，真正服膺于理学的义理还是在成人以后。

宋徽宗重和二年（1119），胡宏 15 岁。在父亲胡安国日以伊洛之学授教的理学氛围中，胡宏日渐不满于前人对《论语》的注解，自己动手撰写《论语说》。这是他的第一部著作。这一时期，他鉴于二程去世以后，二程的语录“散脱不类，流落四方，率皆讹舛，天下所传无完本”^[13]的情况，自己动手收集程氏的“遗言”，编纂《程子雅言》。胡宏开展这一工作，在他是有非常便利的条件的。因为就在胡安国处，就收集和保存了不少的二程语录。也正是在这前后，二程大弟子杨时为了使二程的著作不致在流传中“失真”，着手编辑二程的语录（即后来的《粹言》），胡安国也积极参加了这一工作。二人通过书信来往，交谈讨论不断。胡安国还曾一次寄给杨时两册他保存的二程的语录。这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对于胡宏走上理学道路，都是一个极大的推动。事实上，胡宏也正是以此来要求自己的，以便对二程的言论能“行思而坐诵，息养而瞬存，因其所以言而得其言之所不可及者”^[14]。即要求探寻二程之学的本旨，并用它们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言论行动。若此，则“与侍先生之坐而受先生之教”无异了。这说明少年的胡宏已对程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是，胡安国仍担心他“果于自用”，学术不扎实，便将自己所著的《资治通鉴举要补遗》授予胡宏，要他认真研习，以便能将理学的义理和历史的经验结合起来。由此，在成年以前，胡宏虽说对理学理论尚未融会贯通，但确已具有了相当的理论素养和比较扎实的历史知识。他于是对宁静的读书生活和书斋的小天地逐渐感到不

满足，想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一番。但他的这一志向却因中原的战乱而受阻。他后来回忆说：“至于弱冠，有游学四方，访求历代名公遗迹之志，不幸戎马生于中原，此怀不得伸久矣。”^[15]

宣和七年（1125），胡宏 21 岁。因胡安国治经致用已颇有名声，侍臣李弥大、吴敏、谭世贍合力推荐，授胡安国尚书屯田员外郎，胡安国辞谢。是年十一月，金太宗在灭辽以后，发动了大规模南侵。宋徽宗、童贯的妥协投降政策导致了金兵长驱直入、包围东京（开封）的严重局面。在李纲、吴敏等抗战派人士的敦请下，徽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桓以“收将士心”，桓即位是为钦宗。钦宗鉴于军民群情激奋，不得不于此年正月下诏亲征。但这不过是表面文章，骨子里推行的仍然是妥协投降的政策，亲信的仍然是李邦彦、张邦昌等投降派人士，北宋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

靖康元年（1126），胡宏 22 岁。这年春天，钦宗先后以太常少卿、起居郎召胡安国，三辞不允，乃至京师就任。胡宏最迟于此此时随父赴京而入太学学习。其时，与胡安国以师友相称的杨时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兼国子祭酒，“诸俊秀”汇聚太学拜谒杨时。胡安国也想要结交友人，遂“访士于时”，并同时向杨时推荐了胡寅、胡宏兄弟。二人均拜杨时为师。胡宏问学于杨时的详情，现已无法考订，他自己只提到侍坐时听杨时讲过《中庸》的未发、已发问题，但他并不同意杨时以心的“寂然不动”说“喜怒哀乐未发”的观点。后来为了明辨“道义渊源”，他还就此与同仁进行过多次讨论。另外在《朱子语类》中还记载有一条：“仁仲（胡宏字）见龟山求教，龟山云：‘且读《论语》。’问：‘以何为要？’云：‘熟读。’”^[16]杨时不言《论语》之要而只言求“要”之方，想必有他的道理，即要求胡宏从融会贯通中去自我体验。因为所谓要旨是存在于整部《论语》之中的，不能割裂。胡宏在太学期间结识了不少学人，与张九成及其弟子樊光远等友善。在理论上，胡宏力辟佛学，张九成却援儒入佛，可以说

完全不同；但张氏强调仁心并以心性为本，却与胡宏的思想有相近之处。

胡宏在太学的时间并不长。这年秋天，胡安国因受耿南仲、何桌排挤而罢中书舍人，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不久后辞官回乡。胡宏最迟于此时陪伴其父而归。

胡安国辞官后，考虑到家居的崇安虽远离南宋的政治中心，但却是当时连接江西信州和福建建州的交通要道，易受不时发生的农民起义、兵将反叛和追杀官军烧杀掳掠的连累，故决定举家迁往湖北荆门的漳水边。当时从各地陆续逃往这一代避乱的还有不少学者。胡安国与胡宁、胡宏兄弟在这里遇见了“自荆门溃卒甲马之中脱身”的二程弟子侯仲良。侯氏与胡家的交情日厚。胡宏兄弟遂从父命又拜侯仲良为师，一起研讨洛学。按胡氏父子原来的打算，他们计划就定居于漳水之滨，故胡宏后来有“我祖武夷传世，漳水成家”的说法^[17]。即胡家自江南迁往武夷山区的籍溪后，这是又一次搬迁。在这里，胡宏与侯仲良围绕《中庸》讨论了有关的理学理论。所谓“议论圣学，必以中庸为至”^[18]。《中庸》的心性学说对胡宏性学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时，曾有标明是程颢所作的《中庸解》流传于世，一叫张熹的学者便携此《中庸解》来见侯仲良，侯氏鉴别后却判定：“何传之误！此吕与叔（吕大临，二程弟子）晚年所为也。”^[19]胡宏相信侯仲良的判断，因侯氏与二程是亲戚，且少年丧父，由二程抚养，“其从夫子（二程）最久，而悉知夫子文章为最详”^[20]。同样的《中庸解》，胡宏十年后又在胡安国弟子向沈处见到。胡宏“经反复究观辞气”后发现极类似张载的《正蒙》，于是更加坚信此书出于吕大临，因吕氏原本是张载的弟子，故题其书曰《吕与书中庸解》。胡宏的这一记载和甄别在学术史上是有意义的，后来朱熹对此亦有明晰辨证，可惜今本《二程集》以明刻本为底本，仍收该《中庸解》于其中。

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胡宏 25 岁。由于金兵再次南侵，宋金之间在两浙和长江中游一带展开激战。在此之前，原东京留守宗泽（字汝霖）招募的抗金义军本已聚集于荆州地区保卫家乡，但高宗以“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为由强令解散。宗泽因高宗、黄潜善等阻止抗战忧愤而死后，遭遣散的义军中的部分兵勇仍流荡于荆州一带。侯仲良见此，谓此处必遭乱兵祸害，力促胡家再迁。其时刚好有湘中士人具舟楫前来迎接，于是胡安国听侯仲良劝而举家向南迁移。不久后，这一代果毁于战火，当时与胡家相邻的另一学者因未听侯氏之劝而身遭不幸。胡安国本看重侯仲良的人品、学识，经此事后又深感侯氏的“识时知几”，于是极力向朝廷推荐，希望任用侯氏能有助于维护宋朝的统治。

这一期间，高宗因枢密使张浚的推荐，再以给事中召胡安国，并赐时任起居郎的胡寅手札以催促其父前来。胡安国不得已而赴朝。但刚到池州（今安徽贵池）便闻高宗为躲避金兵而“驾幸吴越”，遂又引疾而返。此时，胡宏因父兄均不在家，义不容辞地负起了“家责”。鉴于当时沮水、漳水一带乱兵甚多，随时都有遭遇不测的可能。胡宏于是护卫其母亲，率众亲属，扔掉了家产和数千卷文书，渡江向南逃避。不久，漳水之家连同其全部家藏悉被焚毁。途中，胡安国从池州返回与家人团聚。胡宏恭奉父母带领全家于是年冬天到了湖南，在这里遇到了不少避难的旧日老友和新交的学人。

起初，胡安国、胡宏率其家人离开荆门向南转移时，并未确定去衡山，而是计划经湖南向吴越一带即胡家祖上之地迁移。但因胡安国“遇腹心之疾，不治而返”，加上胡安国弟子、隐居于衡山的黎明（字才翁）等“卜室庐，具器币”前来迎接，胡安国虽仍有迟疑之意，但“及至湘中，则舍宇动用，便利如归，处之极安”^[21]，于是改变了向吴越迁移的计划。建炎四年（1130），胡氏一家到达湖南衡山地区。

绍兴二年（1132），胡宏 28 岁。胡安国辞官不允，赴给事中兼侍讲任，胡寅和胡宁陪同其父前往。胡宏一如既往，“独将诸房，远寓穷山”，仍留家守舍。这反倒方便了他得以专心于学术的研讨和著述，使其成为胡家兄弟中在理学理论造诣方面的佼佼者。

是年秋，“旱干广远，疾疫盛兴，死亡流散者不可胜数”。胡宏在给时任观文殿大学士，广西、湖南宣抚使吴敏的信中，阐明了他的“民为邦本”和“论兵以足民为要”的民本思想，认为凡事都有轻重缓急，只有先解决本的问题，才能由本之末，循道而治。所谓“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循道而行，则危可安，乱可治；悖道而行，则危遂倾，乱遂亡”^[22]。比如论兵，一定是以足民为要，而不能以兵甲犀利为先，才是深谙于兵道者。

无疑，胡宏在论政方面是比较迂腐的，但他对民情的体察相对来说则比较深刻。从他的理论来源看，虽然不难看到从孟子那里继承而来的民本思想的影子，但主要地还是以胡宏的亲身感受为基础的：“现今秋成，某耳之所实闻者，科役繁重，邵阳富民尽室以逃。目之所实见者，灌阳清湘贫民流转，困于糴贵。举此二郡，他处可知也。将来之虑，将有不可胜言者矣。”^[23]然统辖整个中南、华南地区的吴敏却在这大灾之年“大治屋宇，市炭铁枪，杖牛羊之皮，追发丁匠，虽远亦及。某窃以为抑末也。本之未立，如之何？”^[24]他提醒吴敏决不要因为“近切小利”而忘记了“经国远图”。这种植根于社会政治现实的本末先后观，对于胡宏哲学的本末体用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

次年初，胡安国辞官回到了衡山下与家人团聚。胡氏父子选择衡山为其定居地，还在于他们刚来到此的“徜徉游行”之中，在洞庭之南、潇湘之西、距衡山不到百里之地（今湘潭县境）发现了一清泉小溪，因其“翠绿澄净，藻荇交映，俗以其色故号为‘碧泉’”^[25]，遂因而爱之。胡安国并由此溪水联想到沧浪之水、